汉语动补结构来源的句法分析

冯胜利

提要：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动补形式来源于秦汉时期的并列式动补核心结构，这种双核结构的语法性质是“句法词”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短语，它是在汉语的语序规则的促进下动词后置的结果。根据双核的核心结构要求，[VV]形式如带宾语，其中的自动词必为使动；若使[V]不带宾语而只有主语，则其中的他动词必为被动。此所以“战败 newsp”、“败者项梁”中的自动词既为使动而“世二王”中的他动词必为被动的原因所在。然而，双核结构是不稳定的，双核结构的两极性使其自身由重北向单核的偏移提供了演变的可能。演变的契机来源于语义的偏重而语义的偏重则导致了核心的转移。文章指出：双核的偏移有两种形式，一是由“语义兼并”导致的核心左移，一是由“语义夸张”带来的核心右移。前者使右边的成分丧失其核心地位而变为补语，后者则使左边的成分丧失核心地位而变为状语。右边成分核心地位的丧失带来两种必然的结果，首先是使右边他动词的及物性无能为力，于是其指代受事语义的能力逐渐退化，最终变为自动词，其受事所则使右边自动词的使动用法沦为多余，于是使使动用法也相继消逝。两种结果归为一个结构：动补形式应运而生。与此同时，由语义夸张带来的核心右移也日趋活跃。[Vnab V]也便由此而兴，以至为后来大批的动补复合词创造了新的格式。

关键词：并列结构；核心偏移；动补结构；语序句法

0. 引言

汉语动补结构的历史来源，一直是汉语史研究的热点论题。继
1. 原始双核结构

根据现存的问题并综合最新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动补结构来源于并列式双核心结构的核心偏移。换言之，原来由两个动词组成的“双核结构”变成了“两个动词一个核心”的偏正（或主从）结构。为此，我们先看并列格式的双核结构：

```
(1) VP
   /  \
  V1  V2
   |   |
病而死  (《论衡·道虚》)

继而死  (《左传·庄公十四年》)
```

大家知道，“并列成分”在句法结构上是指前后相互平等的两个结点。换言之，在上面[V1而V2]的结构里，“V1”不是“V2”的核心语、“V2”也不是“V1”的核心语。“V1”与“V2”是两个并列的核心成分（一般用连词“而”衔接）。这样的结构在句法上叫“双核心结构（double headed structure）”，简称“双核结构”。

如果我们承认早期的动补形式（如“压杀”等）源于并列结构的话，那么，无论后来的变化如何，它们原始的结构都是“双核结构”，即（H为核心，NH=非核心，下同）：

```
(2) V0
   / \ \
  V1  V2
   |  |
H   H
压  杀
```

“V1”与“V2”组成一个并列复合动词“V0”。就其内部结构而言，它是一个“双核动词”（double headed verb）；就其形式而言，它跟其他并列动词如“驱逐”、“杀戮”、“诽谤”等的内部结构一样（当然来源不同）。质言之，“压杀”的原始结构是[核+核]，而不是[核+偏]或者[偏+核]。如果早期的并列动词（如“射中”）是并列短语（如“射而中之”）省略了连词（“而”）而得到的话（parataxis），那么，动补形式的原始结构均属并列结构。据此，“扑灭”、“剿绝”（《尚书》）、“战败”、“削灭”（《左传》）等等，均应按照并列结构来分析，它们是两个动词等立连用的复合单位（梅祖麟 1991）。

这样分析动补形式的原始结构不仅有句法分析的根据，而且符合动补结构的历史发展。潘允中（1980）、志村良治（1984）等学者曾指出：动补结构在秦汉以前的表达形式是[V1而V2]（如“射而中之”）。根据我们的材料，[V1而V2]均可有一个类似[V1而V2]的短语形式与之对应。请看：

(3) a. 必楚王也，射而中之。（《左传·成公十六年》）
    晋败楚，射中共王目。（《史记·楚世家》）

    b. 孟孙猎得麑，使西狩之归。（《韩非子·说林上》）
    児孟孙猎而得麑，使秦西以之归。（《晋书·殷中堪传》）

    c. 未而得之。（《韩非子·内储》）
    未得捷子。（《新论·新言》）

    d. 却至射而杀之。（《左传·成公十七年》）
    却至射杀完者。（《史记·晋世家》）

    e. 雷击而杀之。（《论衡·间孔》）
    雷电击而杀之。（《论衡·谴类》）

这说明，不仅[V1而V2]的说法有而有据，[V1而V2]为并列结构的分析也因此可得到证实。因为不仅“射而中”可以变成“射中”（[3a]），而且“猎得”还可还原到“猎而得”（[3b]）。

2. 句法词还是词汇词？

我们虽然可以认定早期的[V1而V2]是并列动词，但它的语法性质及其所从产生的句法运作并不清楚。首先，如何从结构上证明
[V1-V2]词而不是短语尚无人论及。第二，如果它们是词，是句法词还是词汇词，迄今也尚未涉及。然而这些问题十分重要，关系到动补结构来源的句法分析。我们认为[V1-V2]词而不是短语有如下证明：

（4）汉所以不击盗斗，以敌在公所。《史记·淮阴侯列传》
虽非非实，有似是真，故不击灭之。《论衡·佚文》
人同而物堪用，莫不夺之。《韩非·张敬子传》
随得即不打破，道选即打破。《古尊宿语录》
显而易见，“不击盗斗”不是“不击斗而取楚”。“不击灭之”不是“不击之而断灭之”。因此“不夺功”是“莫不夺功”的意思；“不打破”是“不打之不破之”的意思。也就是说，一个否定词同时指称两个并列的动词。并列的两个成分只有词，才具有这样的句法属性，因为短语绝不像如此。

（5）不败而胜，不攻而得。《荀子·不苟》
“不”只能否定短语中的第一个动词，而无法指称第二个动词。如果要否定第二个动词，只有在第二个动词前加注否定词。如：

（6）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论语·学而》


上面虽可证[V1-V2]确可成词，但问题并未就此而结。因为这类由两个动词合成的复合词，既可以是构词法的产物，也可以是句法并入的结果。前者是词汇词，后者叫句法词。如果是构词的产物，则由独立的构词规则来支配；如果是句法的结果，则要由句法的运作来派生。“构词说”与“句法说”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呢？简单说，构词说可以径直规定；在两汉时期，[V1-V2]可以成词。至于为什么和怎样成词的原因，则可另作说明。如果采用句法说，则必须说明什么样的句法结构，通过怎样的句法手段才能得到[V1-V2]，同时还要解释为什么这种运作以前没有发生。当然，构词说也面临着为什么到秦汉时期才出现并列动词的问题。然而，对立词而说，只用一个“汉语双音化”的说法就可以把全部问题交代过去。至于为什么有双音化，则可另行处理。由此可见，构词说要比句法说简单得多。然而，正因其简，许多句法史上与[V1-V2]出现有关的重要问题，都不能因此而得到合理的解决。譬如，虽然两汉语言中的动词并列已经相当普遍，但是合成的两个动词在[[V1而V2]σ]中（“σ”代表一个音节的宾语）仍可分开来用。然而，与此相反的是，在[[V1而V2]σ]中，动词分开则极其少见（如“射而共中王目”）。不仅在两汉，先秦也同善此。显然，[[V1而V2]σ……]的少见与双音节并列动词的出现有很大的关系。构词说很难将这些相关联系的现象统一起来。我们认为，并列动词是在特定句法环境下，为前律所进推的结果（参Feng 1999）。因此，句法说要比构词说更能解释动补形式的来源与契机。

当然，我们主张句法说最可能的主要还在于“隔开式”的结构以及现代汉语中[V+R]与[V+RR]的对立。我们认为，隔开式是在从并列动词向动补结构的发展进程中，补语成熟的一种表现。换言之，没有补语的成熟就没有隔开式的出现（详见下文5.3）。这种补语成熟的隔开式，尤其是双补语的隔开式（参例34），不可能是构词现象，当然更不能按词汇来分析。面对隔开式，词汇说若不进退维谷，也未问责其后。

现代汉语里的动补形式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我们知道，两个音节的[VV]动补形式（如“严关户”）是可以相对自由地携带宾语，但是三个音节的则不然（除了几个第二音节已经轻化的以外，如“咱干净、看清楚、弄明白”等。参李小荣 1994，董秀芳 1998）。比较：
(7) 关严窗户：*关严实窗户
写通文章：*写通顺文章
打牢基础：*打牢固基数
词汇说没有理由不把它们一律处理为动补复合词，因为如果[VRR]是复合词，它们在句中必跟[VR]占据同样的句法位置。然而，如果是这样，为什么又有两个音节的可以带宾语，三个音节就不行呢？([VRR "Obj"]？这里“动补词汇说”如果不求助于某些“ad hoc”的特设规定，是无法自圆其说的。

与词汇说相反，句法说不仅可以让并列，同时也可以让动补的两个成分分别占据不同的句法位置，而它们的“合而成词”则是句法并入的结果。从历史上看，动补词的产生是韵律促使下动词上移的结果（参Feng 1999）。就是说，在[[Vp射_e]而[Vp中共王目_]]这个层次结构里，“共王目”可以与动词“中”那里得到重音；但这样一来就必须把“射”排斥在重音范围之外，结果破坏了“射”与“中”两个动词的并列关系。因此，如果让宾语“共王目”从动词那里得到派生的重音，同时又让“射”和“中”保持并列的平行关系①，那么最直接的运作就是让句中的两个动词“合而为一”，于是才有例(8)的结构（Across-the-board Rule Application，参冯胜利 2000b）。

(8) 并列动词的来源（秦汉双音节动词结构）

略去其他一切技术细节不言，这里最重要的是：(一)V1 的位置必须由一个具有语音形式的同类成分来填补（head-movement）（二）第二个动词并入到第一个动词（incorporation）。根据第一点，V2 结点下的“关”要移到 V1 之下；根据第二点，“严”要并入“关”。亦即：

\[
\text{[共王目]_k}
\]
语气动补结构来源的句法分析

（10）

```
(10) VP
   NP V1 VP2
   V2 VP3
   t_i t_k NP V'

第二动词并入

core词移位
```

运作完成后，我们所得到的就是一个标准的动补句：“严关窗户”。

把普通重音（Nuclear Stress Rule，或“NSR”）考虑进来，上述句法运作就会受到鲁律的制约。首先，普通重音的指派必须在同分子结构下主语（governor）与受语（governee）的两个姊妹节点间进行，换句话说，NSR必须由动词指派给直接管辖的补述语（complement）。据此，重音指派在（10）中没有问题，因为“关严”不仅是一个韵律单位（韵律词），也是一个句法单位（复杂动词）。同时，“关严”直接管辖“窗户”（略去韵律上不起作用的隐性成分，如“语调”、“语代号”等），V1（关严）和 NP（窗户）便成为该结构中同一分子结点 V’下的两个姊妹节点，因此，普通重音可以由主语成分“关严”指派给受语成分“窗户”。可见，句法为韵律提供句子的结构以及句中句法运作的可能程序，而韵律必须根据自己的需要（主语与受语的姊妹关系）在句法结构上找到满足自己的相应位置，才能实现。显然，如果句法结构与韵律要求彼此相合，那么双方都“皆大欢喜”（如（10））。

然而，如果句法提供的结构不能满足韵律的要求，那么所生成的句子要么不合律，要么韵律将迫使句法启动其潜在的运作程序（如移位、附加或删除）来满足自己的需要。韵律对句法的“不合作”绝不“迁就”，因此如果句法不能满足韵律，无论该句的句法如何完美，句子仍不合理。这种情况随时可见。譬如，（10）中的“严”如果不并入“关”，那么“严”就得不到重音（因为它不是“关”的姊妹成分），这样的句子（“关窗户严”）必不合理。“严”的提升是句法允许的运作，但不上移也并不违法。从这个意义上说，“上移”与否不是句法的需要，而是韵律的要求，因为在中古汉语的开方式里，“严”不上移。这一个方面说明不上移并不违法，另一方面也说明不上移必有当时为韵律所“宽容”的其他原因（详见下文5.3）。换言之，上移是韵律的普遍要求，不上移则需有韵律特定时代的特殊条件。

更能说明韵律制约句法人，还是双音节语词的出现。根据重音规则，如果补语是一个双音节形式（如“严关”），整个结构就会受到韵律的枝阻。首先，如果“严关”不上移，那么就和“严”不上移一样，在VP3上得不到重音，句子自然不合理。就中古而言，我们也仅有单音节补语隔开式，而不见“严关”打结破碎的例子。这一个单音节词而双音节词出现的现象不仅说明了双音节为韵律枝阻的实事，而且也暗示出韵律只对单音“让步”的特殊条件。此外，如果双音节补语（严关）上移以后跟前面动词组成“关严实”的话，句子也不合理。因为如果 [动 + 追补] 是三音节，韵律将把它们一律“避”为短语（参冯胜利2001a）。这样一来，其中的补语就变成了动词的姊妹成分，因此必然“依法”而获得重音，而宾语“窗户”则被拒之于外。由此生成的句子自然不合韵律的法（参董秀芳1998）。这就是为什么“关严实窗户”、“严关打牢固基础”等等都不合理的缘故，同时也就是为什么如果宾语不出现，或以“把”字句出现的形式，句子才能文从字顺的缘故（如“把窗户关严实”、“把窗户打牢固”等）。

由此看来，采用句法说，不仅现代汉语中的疑难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古代动补式的来源也可涣然冰释（详下文）
3. 双核结构向单核结构的自然演变


(11) [核 + 核] → [核 + 偏] = [动 + 补](Verb + complement)

因此，动补结构的产生是从“双核”结构到“单核”结构的变化结果。

双核结构是怎样变成单核结构的呢？我们认为，转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并列结构的不稳定性”或“并列结构的多解性”。先看下例：

(12) 言人而泣。《左传·庄公八年》
“人而泣”可以有两种解释。一是并列句：“像人一样地站立起来然后哭泣”；二是状语动词句：“像人站好一样地哭泣”。这两种说法都能有所据。“而”是连词，因此连接“人”和“泣”两个行为，合情合理。然而，“而”还可以连接状语。譬如：

(13) 夫人内，有若外，其可毁足而待也。《史记·高祖本纪》
民皆引领而望，倾耳而听。《史记·淮阴侯列传》

据此，说“人而泣”是状动结构也未尝不可。事实上，上述两读的现象正是并列句的一大特征。恐怕正因为如此，连接并列的“而”才可用以连接状语。如果典型的带“而”的并列句（在语义允许的情况下）可有两读的话，那么没有连词“而”的并列结构就更是容易(在一定的语境中)变成(或者被解读为)偏正(或主从)结构了。双核变单核的运作正是在并列结构具有两解的条件下产生的。就是说，偏正结构自身的两解性提供了“并列”变为“偏正”的可能性。既言之，等立结构是不稳定的，只要条件允许，它就会向单核演变。根据上面的分析，并列结构中的[V1 V2]，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势必发生如下变化：

（14）A. 核心左偏

```
V      V
核    核  →  核    偏
  |    |    |    |
V1  V2  V1  V2
```

B. 核心右偏

```
V      V
核    偏  →  核    偏
  |    |    |    |
V1  V2  V1  V2
```

当然，核心偏移是有条件的，而且左偏与右偏的条件也不尽相同。注意：并列结构和偏正结构都是句法模式允许的结构。因此促发偏移的动力主要来源于语义。据此，我们提出：“语义稍偏则双核趋单”的嬗变条件：

（15）由双趋单的嬗变条件

在并列结构中，两个成分的语义如果偏重于任何一方，均可导致双核并列结构被解读（interpreted）为单核偏正结构的重新分析（句法演变）。


（16）义素兼并（左向）偏倾条件
在并列形式[A-β]中，其中α的义素组合为[A+y]，β的义素组合为[A+x]，如果x的外延包含y，那么x被y兼并而导致语义的左偏。

譬如“绞杀”，其中两个成分的义素组合为：

(17) 绞 = [使死亡 + 用绳系勒或吊]
    杀 = [使死亡 + 用任何方式和工具]

显然，“杀”的第二个义素包含了“绞”的第二个义素。根据义素兼并条件，“杀”的“x”义素将被“绞”所取代，即“绞杀”的语义因之而侧重于“绞”。”

上文说过，语义偏侧是核心偏移的条件。这里必须指出，仅“绞杀”一例而无其他同类语义偏侧的先例，是无法造成核心偏移的，充其量只能导致个例的偶然性误读，而不能构成稳定的、格式化的重新分析。重新分析需要一定程度的条件，需要足够数量的材料为依据，否则不能构成下一代人对偏侧的固定理解，因而也不足以触发下一代人对偏侧的重新分析。因此，孤单单例的“义素兼并”不足以导致核心偏移的发生。换言之，第二个动词的义素必须在足够多的语境里被兼并，才能为下一代积累重新分析的触发经验，才能激活重新分析的契机，最后才能导致核心偏移。因此，如果说“杀”在[V-杀]里的义素被兼并或取代，那么此说本身就意味着其中必有一组同类语词，共同发挥着同一作用。事实正是如此，因为在下位的语言中，不仅有“绞杀”，而且还有发挥同样作用的一组[V-杀]：

(18) 坑杀、推杀、刺杀、击杀、射杀、斩杀、烧杀、诛杀、掴杀、掴杀、掴杀、掴杀……（取自《史记》和《论衡》）

有了这样一组语境环境为基础，语义偏侧才有可能，核心的偏移才水到渠成，于是才导致“世人谓‘(观者)看杀卫玠’(《世说新语·容止》)的说法。这里，“观者”只“看卫玠”而未“杀卫玠”，足见“看杀”的核心是“看”，而“杀”只是其结果，表示“(卫玠)死”而非法(卫玠)死”。

不仅如此，这里的分析还具有一定的预测力。根据我们的理论，历史上可认作早期语词的字，必须先有充分的例见而后趋于成熟。

这对以往的语法分析或许是个“意外”，但对这里的理论而言，则是必然，因为没有足够的例见，义素无法兼并。因此，补动结构的体现与成熟，必不可能“一刀切”。相反，它们必然采取“逐个发展、分期成熟”的演化道路。其所以然者，正是因为核心的偏移与义素的兼并为条件，而每一个词的义素兼并又都要以足够的用例为基础。显然，出现于并列结构中的同期动词，不可能每个都能满足像(18)那样的条件，因此动补结构的出现只能取得“等待时机”、“逐个成熟”的方式。同时，要满足这里的条件，没有足够的时间也难以想象，所以就出现“分期”(或分批)成熟”局面。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我们可以根据“V-死”、“V-破”的成熟而认定动补结构在六朝已经出现，但作为一种新型的语法格式，动补结构直到唐朝才“普遍存在”(王力1958)。即是说，即使我们在魏晋时期可以看到一些确实成熟的动补式，但作为一种固定下来，并且可以自由生产的新句式格式，它仍处于“逐个发展、分期成熟”的阶段。因此，个别动补式的出现，并不等于动补模式的彻底建立。总之，动补结构的产生所以采取“逐个、分期”的发展道路，本文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较为合理的理论根据。

### 4. 双向偏移的必然性

如果我们上面的分析正确的话，那么双核的偏移方向绝不可能只向左，而不能向右。换言之，语义左偏绝对可能。如果双核结构意义上就赋有“两性性”，那么[V1V2]格式中的“核心偏移”就不会只有一种可能，只向一个方向转偏。因此，如果[V1 + 核]可以核心左偏的话，根据同样的道理，它也应该，甚至必然“可以偏右”，亦即：[V1 + 核]→[偏核+V]。

```
(19)  \[ V \]
      \| \|  \| \|  \| \|  \| \|  \| \|
      -核 -核 -偏 -核
      V1  V2  V核  V2
```
逻辑必然如此。因此，上面的假设迫使其得出如下的结论：伴随核心的左移，核心右移的现象也必不可免。这是本文所要强调的第二点，即“左移”、“右移”孰先孰后、孰强孰弱的问题，则有待将来进一步研究。下面就先看定义。

（20）语义类差的右偏条件

在一组[A - α, B - β, C - γ, D - δ]……并列形式中，如果其中A, B, C, D……可以分别构成该组的语义类差，那么语义类差则导致该组并列形式的（右向）偏倾。

“语义类差”是指“一种集合类与其中单个成员的比重”。举例说，“背破、脑破、脑破、脑破、背破、脑破、背破、背破”是一组由不同方式的“破”组合而成的一个集合类。而其中之一（如“背破”）和整个集合的比，就是“背破”在该集合中的语义类差。显然，一个词（如“背破”）要获得它的语义类差，没有包括它在内的“集合类”是办不到的。就是说，没有“类”，就没有“差”。反之亦然，没有“差”也构不成“类”。类是由一个个的“差”组成的。

根据这种原则，我们发现，在两汉[VV]并列形式的出现和积累中，逐渐形成了许多足以构成语义类差的集合体。譬如:

（21）矫杀、自信、自杀、自杀、乐杀、用杀、用杀、用杀、自杀、自杀……（《史记》)

诱杀、赢杀、诱杀、诱杀、诱杀、诱杀、诱杀、诱杀……（《论衡》）


5. 理论推演

5.1 [V + V]的并列形式

有了上面的分析，我们现在可以很容易地回答开始的问题。首先，如果秦汉的[VV]是并列、如果并列的结构是双核，那么由此可以推知如下结果。

第一，[V + V]必然携带宾语，因为两个及物动词的合并，并不影响它们共同携带一个宾语的能力。事实正是这样，如：“敢杀”、“射杀”、“击杀”等等。

第二，[V + V]绝对不能携带宾语，因为两个及物动词的并列无法改变它们原来不能携带宾语的能力。因此，秦汉时期的“饿死、病死”等[VV]并列形式，均不带宾语。

第三，[V + V]和[V + V]绝对不能携带宾语，因为一个及物动词和一个不及物动词，在并列式句法结构上如果并入为一个复合词，就会导致论旨结构上的冲突。其结果则“两败俱伤”而无法实现。因此，在秦汉的[V + V]并列形式中，几乎不见此类形式。

第四，[V + V]和[V + V]均可以携带宾语，因为如果不及物动词用为使动（如“坏大门及寝门”《左传·成公十一年》、“留文公败楚于城濮”《史记·周本纪》），那么在句法结构上，它就可以和及物动词“共指”（share）一个宾语，并入后仍然保持并列的关系而不变。因此，上述两种格式均很能产，以“败”为例，如：（《左传·成公八年》）“败陈须梁。”《史记·灌婴列传》“败获须梁。”

第五，[V + V]不带宾语，如：“百余人皆婴死”（《论衡》）、“军吏皆斩死”（《史记》）、“二世杀死”（《史记》）。尽管“压”、“斩”、“杀”都是及物动词，但在这里却是不及物的（dethematized），因为它的宾语“百余人”、“军吏”、“二世”都提升到主语的位置，表明它们在这里的用法是“被动”。古代可以用单独动词构成被动式，“龙逢斩，比干剖”（《庄子》）、“良弓藏，遂狗烹”（《史记》）等等皆是。如果这里的第一个动词用为被动的话，那么它和一个不及物动词自然可以组成一个并列复合词。

上述几类形式都是由并列复合的句法性质所决定的结果。它和我们所见到的材料也相互吻合。反过来说，就我们目前所见的材料而言，上述复合式句法性质不仅可以告诉我们怎样的组合是允许的，而且告诉我们什么样的形式必须加以改变才能进入 VV 并列的句法结构。换言之，[V, V], 若带宾则 V, 必用为使动；如主语为受事，则 V, 必用为被动。总之，两个动词的组合，必须以它们并列的属性为根据。

5.2 核心左移后的句法演变

前面说的是并列双核组合的句法属性。然而，双核结构并非一成不变，它自身的两解性决定了它左右摆动的两可性。从理论上说，如果核心的偏移是并列的属性，那么左右偏移则势所难免。更重要的是，如果偏移的结果恰好给旧有的系统增设了崭新的模式，那么偏
倾就不再是一种可能性的摇摆以及有条文的转移。相反，它因此而获得了偏移的自由和去向。它可以冲破一切偏移的阻力。成为一种有目的的创新行为。非到新型结构的彻底建立，“借助偏移来创新”的活动就不会停止。我们认为，这正是[并列→动补]的发展过程与契机。并列的左偏带来了[状→动]而其左偏则增添了[动→述]。偏移的结果确为语言创造了新型的结构，尤其是左偏。显然，如果说西汉以后的“文得”、“文得”(《论衡》)、“文取”(《文赞百字》、《佛本行集经》等)已经表现出局部趋势的话，那么可以说[V_V]就是左偏的“始作俑者”。就是说，在[V_V]并列的格式里，首先是他动词通过“语素兼并”而开了左偏的先河，继之而起的便是其中的自动词。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演化特点是“借助偏移来创新”，因此无论居右的是自动或他动，均与原来的并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时也就是为什么这一时期有不断增长的个例，但仍然不被大规模的依赖。

新型结构何以能够“不期而然”呢？原因中在结构，因为双核一旦左移，其结果必然与并列大不相同。就是说，虽然偏移有动力(义素兼并)但结果并不是它的目的。简而言之；核心转移以后，该形式必以核心词的一切句法属性为根据。这样一来，非核心词就丧失了决定它所在形式的任何句法属性的权力。核心转移后果之大、核心概念之重要性，正在于斯。据此，我们可以推知核心左移后的不同结果。

```
(23) H Comp
    打杀 V_1 V_2 带宾语
    打死 V_1 V_2 带宾语
```

核心居左则以左移定性，这就是为什么[V_V]在并列结构中不能带宾语，而在并核结构中则可以带宾语的根本原因。

最值得注意的是右边成分的变化。右边成分丧失了它们的核心地位以后，地位变了，它们的性质也必然随之而变。因此，在动补结构的演变中，变化最大的就是它们。

我们先看[V_V_1]中右边的“V_1”的变化。仍以“杀”为例。在“杀杀鲁桓公”(《史记·齐太公世家》)里，它是并列核心，但到了“坑杀”、“帷杀”、“刺杀”、“击杀”、“射杀”、“斩杀”、“烧杀”、“诛杀”、“扼杀”里，它的部分义素被兼并，被取代，造成语义的左偏，致使在“烧杀、溺杀”之中，“杀”只有“(致)死”的意思。注意：虽然它在语义上离开了信息的中心而开始“概化”和“虚化”，但是它这个阶段的“虚化义”仍然得靠“兼并语境”中同类动词的“协作”才能保持。换言之，这一时期“杀”的“(致)死”义并未独立，离开了“烧、溺”等提供的条件，便不复存在。我们认为，只有当“杀”彻底丧失了句法上的核心地位的时候，它的及物性才成为“多余”；而只有当“杀”的及物性无从使用时，它才开始丧失其指派宾语论旨的能力。一旦“杀”丧失了指派宾语论旨的能力，它就和“死”一样，只具有不及物动词的句法性质。

如何确定完成转变的单核结构呢？我们提出如下检验方法：当核心左移后的[V_V]形式不可能再被解读为[V而V]的并列结构时，就标志着它的演变已完成，即：

```
(24) [VC]—下→[V而V]
```

这条标准运用起来十分简便。譬如：“世人谓'(观者)看杀卫玠’”《世说新语·容止》，”看杀卫玠“并不是“看而杀卫玠”的意思。因此，“杀”必属左核心动补结构。再如：”白杨多悲风，萧萧愁杀人“《古诗十九首》”的“愁杀人”不是”愁而杀人”；而”旁人侧问笑何事，笑杀山公醉似泥“《李白·襄阳歌》”的”笑杀“也不可能“笑而杀之”，因此均属动结变化的完成形式。我们认为，尽管最初的以及演变当中的[V_V]形式均有解为[V而V]的可能，但是完成演变的动补形式必将不再复原到[V而V]的形式，因为它们已然是核心左置的结构。比较：

```
(25) 袭取《(三国志)》—→袭而取之《(三国志)》
    夺取《(史记)》—→夺而取之《(晋书)》
    逐得恶《(论衡)》—→x→*逐而得恶
    逐得五通《(齐民要术)》—→x→*逐而得五通
```

根据这种分析，从[V_V]到[V_V_1]的演化过程是：语义偏移→核心转移→丢失论元。从句法上说，只有当V_1彻底丧失了指派(受事)论
旨能力的时候，它才是真正的动补式。因此，鉴定动补成熟的标志可以借用[V而V]来鉴定。当然如果再有施开式为参考，则更足以说明问题。譬如，“以手掌盛取少汁饮”（语本《实名集》），“盛取”不等于“盛而取汁”，因为“以手掌盛取”并不是用手掌取汁，“取”在这里不与“汁”构动宾关系”（曹广顺 1999），此外，又加之以“抱魔王取”（《佛本行集》）的存在，就更足以说明这里的“取”已是一个成熟的补语。

下面看右边不及物动词的变化。上文说过，及物动词首先丢失了它们的及物性而转为不及物动词，这意味着“借动偏移来创造新型格式”的方向已被确定。有了方向和目标，对不及物动词来说，偏移则是轻而易举之事，因为它可以简单地抛弃其使动用法而“回归本性”。这是动词的转移方向的自然结果。前面指出：在并列时期，[V1, V2]中的“V2”是迫于与V1的并列而不得不用为使动的。现在不然了，因为这种强制在核心移以后不复存在，V2的使动用法自然也就随之变为多余。再加上以左偏可以创新，于是，到了六朝大部分的V2用成了V1，即使使动用法大量减少。从某种意义上说，在核心移的过程中，最得宜（得意）的不是及物动词，而是不及物动词（或形容词），因为它们由此而可“返旧归真”。所以，根据我们的分析，使动用法的消失不是动补发展的原因，而是其结果。换言之，“战败”果不先从并列式转变为单核式结构，“败”生的使动用法不可能失效，因为它所处的结构（[[V1,V2],Obj]），不允许它不用为使动——在并列结构里，“V2”也是核心，不用为使动，是无法携带宾语的。然而，当巴核结构的核心移以后，如[V,V]中的“死”就可以永远“告别”其使动的强制，因为其动宾已和它无关，它由此而获得自由。“死”获得了解放，它对[V,V]中V的限制也就相应地消失，因此[V,V]中的V，也有了自选的自由、同时还有了携带宾语的自由，于是出现[[V, V],Obj]。

（26）是韩父老狗，乃打死之。（《太平广记》四三八引《云间录》）
在这个结构里，V2 的提升是必须的。然而 VP3 里面动词的并入，则据不同的语言而有不同的情况；换言之，最后一个动词（严）既可以提升并入到 V2 的位置与“关”合成一个句法词（如当代北京话），也可以保留在原来的位置被 V2 所支配（C-command）。事实上，埃维语（Ewe）正是如此，请看例（28）：

(28) Me nya devi-e dzo.
我 追 孩 子 跑
Me a fo kadga gbe.
我要 打 听 碎
我要打碎台灯。

汉语动词结构来源的句法分析

(30) 打汝两侧齿 （《贤愚经》）：打汝其脚 （《贤愚经》）
狂风挽断最长条 （杜甫《漫兴》）：霜气数年吹路断
（《删闻鉴赋卷后之语》）

先去水滴 （《佛本行集经》）：盛清尿粪 （《佛本行集经》）

砍七多罗树干 （《佛本行集经》）：割断一切魔网 （《佛本行集经》）

以屏呼蜂蝇杀 （《百喻经》）：咋杀太子 （《六度集经》）

我们认为，这一结论不仅合乎语感，也符合事实，道出了“分用”、“合用”实为一的本体所在。兹更添数证如下：

(31) 脚踏地坏 （《十诵经》）：踏坏华室 （《出曜经》）

打破头 （《大庄严论经》）：打破其恶 （《大庄严论经》）

打破头 （《百喻经》）：打汝头破 （《祖堂集》）

两手抱魔王取 （《佛本行集经》二九）：两手安徐捧取
（《佛本行集经》一三）

为什么分用和合用会在、或者要在、甚至必须在同一时期出现呢？我们的分析提供了理论上根据。不仅如此，根据理论的推测，所有的隔开式都必须有同期的“合用”为其基础上才出现。上面的例子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当然，我们不敢说迄今所见的隔开式都能找到同期的合用式，但这是事实的问题。最要紧的是理论告诉我们，甚至强迫我们去寻找。这就是所谓“为理由找现象”或是“演绎”的作用所在。显然，本文的理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以进一步对此展开证伪与证实的新线索，从而把我们对动词来源的理解不断推向深入。

其次，前面说到（见图 10 的分析），隔开式在现代汉语中不能满足韵律上的要求，所以第二个动词必须并入到第一个动词之上。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面对两个疑问必须解决：1) 如果隔开式不合韵律，为什么它会产生？2) 它既然出现，为什么又会消失？

首先，前面提到（参注①），在句法表层未曾并入的动词，实际上
在逻辑层面也要并入（LF Incorporation）。所以，从句法原理上说，不存在不并入的情况。其次，就中古汉语而言，隔开式出现在六朝，但事实上，它从一开始就未能取得足以跟并用式相抗衡的地位。不但如此，“到宋朝以后，VOC这种形式逐渐减少，到现代汉语中，就基本只用VOC式了。”（蒋绍愚 1994:192）我们还注意到，有的隔开式如【VOC破】，到了唐代，已非常少见。因此，我们不仅要为它的出现找到根据，同时也要为它的消失找到理由。

根据上面的分析，隔开式所以出现是因为它有句法上的根据。换言之，如果没有其他因素的影响，动补结构或可按照隔开式的路线发展而畅通无阻（像纯合语一样）。而汉语没有向那个方向发展，这倒是我们所要着力解释的难题。我们认为，其原因就是能够提到的韵律的作用。而说之，韵律不允许隔开式，因为补语不上移，无法得到音重音（NSR）——于是句法与韵律发生矛盾。矛盾的解决要么牺牲一方，要么调和双方。我认为，隔开式的出现是双方调和的结果，是一种句法表层并入，而韵律又可以容忍的结果。也就是说，最后的补语必须取较轻的形式（负载重音）才能出现。因其自身不载重音，重音才可以指派给前面的宾语。隔开式的补语均不是载重形式，这可以自以下几个方面来看出来。首先，隔开式的补语不能独立。比较：

（32）饮酒醉（《史记·吴广列传》）：打头破（《出曜经》）

（33）饮酒醉（《史记·张丞相传》）：啄雄鹄杀（《百喻经》）

如果作为主语辨志的状语训练，左边的两句可译为“饮酒，醉”、“饮酒，醉”；但右边的两句则不能点成“打头，破”、“啄雄鹄，杀”。这说明左边的是两个分句，右边的则不能分开；同时也可以说明，“醉”、“尽”必须置定，而“破”、“杀”则不必，因为前者可以独立，而后者不能。此外，我们还有（33）里面的对立；

（34）打败败破（《坛经》）

弹尽（相思破）（《示秋夫》）

斩破顶箭乱（《汉将王陵变》）

打打头破（《太平广记》卷四三）

射杀野鸯死（《佛本行集经》）

破破诸恶（同上）

解释这些现象至少要回答三个问题。第一，上面的句子为什么没有
说成“‘打烦恼破痕’”？第二，为什么也没有说成“‘打烦恼破痕’”？第三，什么原因让“破痕”字拆开，一个并入面的动词，一个留在后面的位置？现有丙的分析而说上述问题均很难从结构上得到满意的回答。然而，根据我们的理论，它们所以必须如此则很好解释。首先，就句法而言，“破”和“痕”均可同时（以分别并列的形式）出现在（27）中 VP3 下的底层结构里。其次，如果这两个成分同时提升并入动词“打”，那么“‘打烦恼破痕’就跟‘‘关狭浊窗户’一样不合韵律之法（见上文）。然而，如果它们都留在最后的位置，变成“‘打烦恼破痕’”，也违反隔开式补语位置“宜轻”的韵律要求。就是说，它们同时上移或同时居后都不是最佳的选择。因此，唯一的办法就是让其中之一“提升并入”而另一个留在原地。这样才能两全其美，各得其宜。可见，（34）的例子不仅证明了提升并入的句法运作，同时也说明了隔开式补语位置“宜轻”无容置疑。否则无法解释为什么两个语义类似的殿后补语必须“一留一提”而不能“同留（或同提）”的现象。因此，我们说，隔开式殿末的补语不宜重，就是它所以为韵律所宽容，所以能在成句中出现的特殊条件。

最后，不能重谈的分析和前面隔开式补语分析也不妥而和，二者都要求先有“合用式”出现。可见，它们的内在机制是相互吻合的。然而，为什么它们又逐渐减少以至消失了呢？不难想像，如果隔开式补语形成依赖于合用式的发展和积累的话，那么它的出现和使用将会受到极大的限制（这就是为什么隔开式不如合用式普遍的原因所在）。换言之，单音节补语在合用式中越成熟，在隔开式中就越适宜。因为词语的使用频率较高，音义的磨损程度就越大。然而，到了动词模式彻底建立（不再是逐个发展）的时代，到了动补结构可以自由创造而不依赖核心偏移的时候，隔开式也就丧失了为它的补语制造“高韵轻化”的韵律条件，它也就逐渐被淘汰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唐代的隔开式一般都在诗歌里的缘故，因为诗歌是协调（或者摆脱）散文韵律缺陷的最佳语境。

附注

① 中古以后，连词“而”字逐渐消失，“而且”字的消失改变了汉语 VB 结构的性质，但“而且”字所以消失，我认为，和动补式的关系有直接的关系。


③ 当然，什么时候带宾语的问题仍有争论。但是这是一个材料处理的问题，尽管在处理材料时要奉承到其他理论问题。

④ 有的学者认为秦汉动词并列形式源于“连动结构”，这跟我们的分析并毫不矛盾，因为即使连动结构也可分析为“并列式连动”。

⑤ 感谢审稿人为本文提出的例句。

⑥ 有关汉语“语词词”与“句法词”的区别，参照冯胜利(《论汉语词汇的多维性》中国语言学2001年第3期)。

⑦ 譬如，(第十九子·说林上)已用并列动词，“孟孙猎而得麋，使西巴猎之”归，但是在(晋艺·密周传)中却仍用[fl而问f2]，“曾孟孙猎而得麋，使西巴猎之”归。

⑧ “怒而触不周之山”(《淮南子·天文》)不属这里讨论的类型，因为“不周之山”不是“怒”的宾语。

⑨ 并列式两边的成分力求音步平衡的要求，还可以从现代汉语中看出，譬如。

一有事[找他或者找我]都可以。
有事[找他或者找我]都可以。

⑩ 这里的指派规则是对“动词指派语重音”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它突出强调同一分析下为主动词与受动词之间的指派关系。汉语，普通重音只能指派给动词在表层结构上直接管辖的姊妹成分，若该成分不是隐成分(参见冯胜利2006a)。因此，在(37)中的表层里，V 不能把重音指派给 Y 或 Z，因为 V 与 Z 由或 V 与 Z 都不是单一成分的姊妹节点。普通重音规则的严格否定可表述如下：

\[
\text{NSR}
\]

在任意两个姊妹之间，(X 与 Y)，如 X 与 Y 具有选择性(selectional)关系，且 X 直接管辖 Y，则 Y 重。

管辖概念的定义表述为：

Government

a. 管辖 \( \beta \)，如且仅如；
b. \( \alpha \) 和 \( \beta \) 都是词汇形式；
c. \( \alpha \) 和 (c-command) \( \beta \)；

d. 每一指控 (dominate) \( \alpha \) 的分枝结点同时指控 \( \beta \)。

① 动补形式如“‘我”提拔”等“打扫干净”以及“理解错”、“消灭掉”等的韵律分析和句法运作，均可在该树形结构上得到合理的解释。因篇幅所限，这里不
能详细讨论，读者可参看董秀芳（1998）、冯胜利（2000b）的有关论文。

① 　最初的[VV]也不可能是核心词组的结构，因为这样无法解释为什么最初的[V + V1]（如“六点”）不能带宾语。

② 　从信息位上看，具体的总比一般的更重要，有价值。所以兼并也可以是信息位竞争的结果。

③ 　图篇章限，本文不拟在详细讨论有关当代动补结构论元与论旨的有据问题，但原则说，句法结构（27）可以生成目前分析的动补结构（参 Li 1998）。例如，两个动词的动补式也可以带宾语，但在句法结构上这个宾语实际上（采取 PRO 的）第二个动词的主语。

④ 　其实，即使是现代汉语的动补结构，也可以有不同的理解：

a. 那只鹿是撞死的，不是病死的。

b. 他开车撞死了一只鹿。

“撞死”在不同的语境里，可以表达不同的意思。a) 强调的是“死”的方式——“撞”；b) 强调的是“死”的结果——“撞”。是不是现代汉语里的动补形式也应该按照“左核心”与“右核心”来分析呢？这牵涉到一个层次形式两个底层结构的理论构建（参 McCawley 1988：278）。这虽然不是本文讨论的对象，但不是不可能的。因此很值得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⑤ 　吴福祥（1999）举出下面的例子，似乎说明这是以后的[V + V1]（包括 [V-Vi-Vj]）可以作为动补结构的核心，亦是语义中及物动词的及物性。

横食他则出，何故被剑子所？（《公羊传·宣公六年》）
孔子食鱼乎？（《论语·述而》）

匈奴左贤王当部落等兵，以为汉兵不能至此，饮酒。（《史记·卫将军列传》）

吴文认为上面的句子各是连句的组合，而把其中的“把”和“被”理解为不及物动词，然而，这种论述和分析尚有待更多材料的进一步证实。

⑥ 　注意“用途”的减少并不等于格式的消失。根据这里的分析，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说“使命”的“用途”的放义有大幅度消减，而不必求助于难以证实的“使命”的消失，因为即使是到六朝，使命也只是减少，并未消失。“萧萧愁杀人”的“愁”用如使命，即是其证。

⑦ 　我们不认为“隔开式早在先秦就已经出现”，即使出现也不是本文所说的隔开式。本文讨论的隔开式与有之相应的合用式。而先秦“止于语序”的一种句型没有“止于语序”式的合用式。因此，如果说先秦已有隔开式，那么先秦的隔开式和本文的隔开式也不属同一结构。

⑧ 　参见胜利（2000a）。

⑨ 　实际上，即使第二个动词在句法表层没有及物，根据 Collins（1997）的分析，它在逻辑形式上仍然要及入到第一个动词，是为“隐形及物”（LF-Incorporation）。

⑩ 　参见胜利（2001c）。

⑪ 　在现代汉语（普通话）里，隔开式不合法语。当然在某些方言里还仍然可及，这需要进一步研究。

⑫ 　这里笔者感谢审稿人对本文提供的上述例句。

⑬ 　现代汉语里的“打不破”也只限定“可能”而否定“结果”。“

都因为后一种句子的修饰语无法提升并入。此所以间修语形式不能进入结构（27）的原因所在。

⑭ 　注意：〔虚表动词的〕“是”〔虚表动词的〕“是”的状语，不是“狼”的补语。真正的反例是“制御制平直”（《三国志·马良传》）。

然而，文献不见“制（平）（直）……”的说法，故而真正的反例仍有待进一步的发掘。

参考文献

曹广顺（1999）试论汉语动态助词的形成过程，《汉语史研究集刊》2，巴蜀书社，成都，74—89 页。

董秀芳（1998）述补兼及句中的韵律制约，《语言研究》第 1 期。

冯胜利（2000a）汉语语序句法学论，《学术界》第 1 期，合肥，100—123，94—117 页。

（2000b）《汉语语序句法学》，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

（2001a）从句法看汉语“词”“语”划分之大界，《中国语文》第 1 期，北京，27—37 页。

（2001b）论汉语“词”的多维性，《当代语言学》第 3 期，北京，161—174 页。

（2001c）从人到本末的逻辑学的转型，手稿。

何乐士（1984）从《左传》和《史记》的比较看《史记》的动补式，《古汉语语法研究集刊》商务印书馆，北京，2000。

黄征（1996）敦煌俗语法研究之一句法篇，《敦煌吐鲁番研究》1，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

蒋绍愚（1994）《近代汉语语法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

李小斐（1994）对述结式带宾语功能的考察，《汉语学习》第 5 期，延吉，32—38 页。

潘允中（1980）《汉语动补结构的发展》，《中国语文》第 1 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

太田辰夫（1958）《中国语言文字学》，蒋绍愚、徐昌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北京，1987。

王力（1944）《中国语法理论》，商务印书馆，北京。

（1958）《汉语史稿》，科学出版社，北京。

吴建国（1993）试论现代汉语动补结构的来源，载《汉语史概论》《中国语言学史》国际研讨会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北京，317—345 页。

杨建国（1959）述补式发展试探，《语言论集》第三集。
余健英 (1957) 使成式的起源和发展，《语法论集》第二集。
赵长才 (2001) “打破烦言碎”句式的结构特点及形成机制，《汉语史研究集刊》4, 巴蜀书社, 成都, 13—22 页。
周迅明 (1958) 汉语的使成性复合词，《文史哲》第四期。
志村良治 (1984) 《中国中世语法史研究》，江蓝生、白维国译，中华书局，北京，1995。


(2118 Wescoe, Lawrence, KS 66045, USA E-mail: sfeng@ukans.edu)